

从农民到经理,不只是名字和身份的变化,  
更是农业经营方式的一次变革

# 农场主“转正”

文/本报记者 赵松刚 片/本报记者 孙国祥

在推行家庭农场之前,诸城市许多农村里,已经有不少农民通过流转土地的方式,探索着规模化种植、养殖方式,虽然,当时还并没有家庭农场的提法。

中央一号文件的下发和诸城当地政府的扶持政策,给这些试水的农人带来惊喜,他们从一个没有“名分”的农场主,变为有证的农场经理。

## 王汝礼： 农民中典型的商人

还有半月就到烤烟季,看着今年大丰收的黄烟,王汝礼兴奋不已。

王汝礼如今种着1000多亩黄烟,口粮地,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农场经理。而就在2008年之前,王汝礼从事物流运输12年,家里养着6辆大车,还没有踏足黄烟种植这一块。

一次偶然机会,当地烟草公司的一名负责人找到他,提出可以投资种植黄烟,“以土地流转的方式,社区里帮忙协调,从附近的村民手里流转一片地,规模化地种植黄烟”,王汝礼说,第一年,他就流转到200亩地。

王汝礼发现,这比他搞运输能赚到更多的钱,虽然开始过程中并没有那么容易。

“最主要的是资金的问题,流转地的钱,买机械的钱,第一年的投入有些大。”王汝礼说,他把搞运输时积累的资金投入到黄烟种植上,2009年4月份,他干脆卖掉大车,把精力全部投入到黄烟种植上。

在王汝礼踏足黄烟种植时,已经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,但是他们这种种植方式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,只是被称为“规模化种植”,一切都还很模糊。

王汝礼的黄烟农场,以当时所在的村庄命名,叫“闫家庄农场”。

尝到甜头的王汝礼继续拓展自己的黄烟种植,最初的200亩变成400亩,400亩变成600亩,直到如今的1100多亩。他的黄烟农场跨着贾悦东、闫家庄、吴家庄等多个村庄。

2013年,诸城市下发家庭农场相关文件以后,王汝礼成为山东省第一个工商注册烟叶种植家庭农场,并命名为“诸城市丰盛烟叶家庭农场”。家庭农场,王汝礼总揽管理大权,“媳妇管财务,从附近几个村雇了三个种烟好手,负责技术。”而田间的耕作,也从原来的人工交给大型机械。

“这就是规模化生产的优势”。王汝礼说,从黄烟育苗到移栽到最终的烘烤,整个过程依靠机械化运作,这是散户经营所做不到的,因此能够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。

王汝礼迈开第一步,就没打算再停止。对自己,他的评价是,他是农民中最典型的商人。

“我从来不做赔本的买卖,赚的钱少也不行”,王汝礼笑着说。

家庭农场的确立,让王汝礼感到自己所做的事有了一个强大的后盾。“家庭农场有很多好处,光是每年的补贴都是一笔不小的费用。而且,作为家庭农场的法人,就能够以法人单位进行贷款,贷款还有优惠。”



王汝礼的烟田一眼望不到边。



宋海元在田里查看今年的玉米长势。

## 宋海元： 从农民变成“经理”

冯家庄的宋海元,是诸城市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。他的名字,从1996年买下一片60亩的低洼地开始,为人们所熟知。

1996年,宋海元包下一块没人要60亩的低洼地,“这块地是在几个村的分界线上,是个洼地,种不了粮食。”

包下这块地后,宋海元便种上了小麦,“基本上都淹死了。”后来,他又种上玉米,雨水又灌倒了地里,玉米也死了。

他这才发现,这块60亩的地,真的是一块硬骨头,并不好啃。而当初将地承包给宋海元的村委,又不愿意退还。宋海元决定,用自己的方式解决。

他开始改造这片地,自己投资在周围挖沟,疏通雨水,在高的地方种粮食,低的地方种树,以“树粮间作”的方式,解决低洼地的内涝问题。

这片地终于给他带来了回头钱,每亩地能收获小麦400斤,玉米一亩700斤。宋海元解决了这块地的难题。

谈起这段过程,宋海元说,当时一切都要靠自己,没有任何的政策扶持。但是,这并不是宋海元最后一次“犯傻”。

2009年,宋海元又包下另外一块更大的低洼地。这一次,他包下的土地面积是400亩。

包下这块地,宋海元从事的是黄烟和粮食种植。这一次他吸取上次的教训,从一开始就对土地进行改造。

家庭农场的概念提出后,宋海元以“诸城宋海元粮食家庭农场”的名字注册了自己的家庭农场。

宋海元从种植大户变成了农场经理。他的农场,面积1000多亩,覆盖贾悦镇、枳沟镇、舜王街道、石桥镇四个乡镇。

在拓展农场的过程中,宋海元也感受到不小的阻力,“社区里有专门的土地流转服务中心,他们负责与村民进行沟通,制定好统一价格,我省了很多心”,宋海元说,在土地流转过程中,单靠一个人的力量,根本无法完成。

“即使你跟几个人熟,能把地要过来,但是总有一些人,你不认识也打不上交道。只有成片承包,才能用机械,所以就得需要政府出面。这个过程,其实是很困难的。”宋海元说,家庭农场的推行,他实实在在是受益人。

领到营业执照的宋海元,成了农场经理,他现在要干的事情更多,从签合同,到谈业务,他的工作也从单纯的农民,渗入更多的“经理”成分。

但是,宋海元也有所担忧,“虽然政策有了,但是,现在每年打下来的粮食没有地方囤,打完就得卖出去。”宋海元说,晒粮和囤粮的地方非常有限,是他目前想要解决的事情,这又需要政府的帮助。

## 丁强： 能不能再放开些

丁强是舜王街道丁家庄村的养羊大户。2013年4月17日,丁强正式申请注册诸城市丁强肉羊养殖家庭农场。

2005年,丁强在原有有一个鸡场的基础上,建起一个两亩的养牛场,“最开始只有18头牛。”三年以后,丁强通过市场考察发现,养羊更加利于管理,投资的回报率低,患病率也低。

于是,丁强决定转养牛为养羊。为了解决资金问题,他只能通过自己的关系,向亲戚、朋友借钱,“没有政策支持。投资很大,风险也很大。”

另外,在与村民沟通流转土地时,为打消一些人的疑虑,他一次性付清了20年的承包费用,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。

创业最初,丁强一个人顶住了所有压力。

7月17日,记者来到了丁强的养羊场。场里养殖的是小尾寒羊,几名工人正在作业,已经初具规模。“现在养着2100来只”,丁强说,他的养羊场,一般养羊的数量都在2000—3000只左右。

但是,丁强并不满意。他说自己现有的土地面积和养羊能力,只用到1/4,他可以同时养8000只,“但是缺钱”。

丁强的养羊场有一台花费十几万元购置的打捆机,“这台机器每年打的秸秆,可以解决8000只羊的饲料。”丁强说,因为资金短缺,而银行又不肯贷给他更多的钱。资源根本无法充分利用,这让他觉得浪费。

在贷款的过程中丁强发现,虽然他已取得工商注册的登记,但是在一些银行还是“不好用”。“他们觉得我这就是一家养殖场。土地是流转过来的,不能作为抵押使用,而活羊抵押不稳定,也难以作为抵押。”丁强最终从银行拿到的贷款,有些杯水车薪。

丁强觉得不公平,“我现在的养羊场,每年所得的利润,赶得上一家企业。银行肯把钱贷给这些企业,为什么就不能贷给我?”丁强说,他的家庭农场,绝不会输给一个小型企业,但却得不到一个小企业所享受的贷款。

家庭农场实现的规模化养殖,其赢得的利润,会随着规模的扩大而增加,“一只羊能赚100块钱,十只羊,绝对不是1000块,而可能是2000块,3000块。100只,1000只,10000只呢,我觉得银行可以对我们再放开些。”

丁强说,诸城的家庭农场走在了前面,一切都是尝试,他们作为家庭农场的经营者,更想看到实实在在的政策,帮助他们“转正”以后的路上走得更稳、更好一些。



丁强家庭农场里养殖的羊。